

# 西安事变 与东北军将领

纪念西安事变六十周年专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沈阳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 西安事变与东北军将领

——纪念西安事变六十周年

沈阳文史资料 二十二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沈阳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

## 序 言

政协沈阳市文史资料委员会，为纪念西安事变六十周年，征编了《西安事变与东北军将领》专辑。思念千古功臣张学良将军，和已牺牲的杨虎城将军以及其他革命烈士；歌颂中国共产党光明磊落，以民族大义为重，捐弃前嫌，“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对推动国共再次合作，团结抗日，起到了重大历史作用”的丰功伟绩。这本专辑的出版，无疑是进行社会主义、爱国主义、革命传统教育的好教材。

西安事变前，张学良曾苦苦劝谏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均被拒绝了。当蒋介石调集嫡系约 30 个师准备从豫入陕甘参加“剿共”后，他又于 1936 年 12 月 4 日飞抵西安，逼迫张、杨两将军率领全部军队开赴陕北前线“剿共”。张学良、杨虎城连续几天向蒋介石反复进谏，却遭到蒋的严词训斥。12 月 7 日午后，张学良到蒋的下榻处华清池去，再次向他痛陈利害。两人争论了二、三小时，张学良讲得声泪俱下，蒋介石竟无动于衷。最后蒋介石把桌子一拍，厉声说：“你现在就是拿枪把我打死了，我的‘剿共’政策也不能变！”这样，就把张、杨逼上梁山，除发动“兵谏”外，已别无他路可走。

12 月 12 日凌晨，按照张、杨商定的计划，东北军约六千人，分内外线以迅速行动包围华清池，逮捕了蒋介石；第 17 路军同时行动，控制西安全城，囚禁了陈诚、卫立煌、蒋鼎文、朱绍良等国民党军政大员。张、杨通电全国，说明发动“兵谏”的原因，提出八项政治主张：“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之政治自由。七、确实遵行总理遗嘱。八、立即

召开救国会议。”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使南京政府极大震惊。在如何对待事变问题上，南京政府当权势力中出现了讨伐张、杨和同张、杨进行谈判以营救蒋介石的两种对立主张。倾向于亲日的军政部长何应钦在取得指挥调动军队的大权后，立即调遣军队，组织东、西两路集团军，准备讨伐西安。亲英美派的蒋介石的亲属宋美龄、孔祥熙、宋子文等，不顾何应钦的反对，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营救蒋介石展开活动。

中国共产党在事变前没有与闻这件事。事变一发生，张学良立刻致电中共中央，希望听取中共的意见。中共中央派遣周恩来于17日抵达西安。对张、杨发动西安事变的用意和主张，中共中央抱着充分肯定的态度。对西安事变应该怎样解决，中共中央在弄清情况并经过认真研究后认为：如果把南京置于同西安敌对的地位，有可能造成对中华民族极端危险的新的大规模内战，这是日本和亲日派所欢迎的前途。现在仍有可能争取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从而为结束内战、一致抗日创造条件，这是全国人民和一切愿意抗日的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所欢迎的前途。因此，坚决主张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这与张学良和平解决事变的既定方针不谋而合。

南京方面在了解张学良、杨虎城以及中国共产党皆无意加害蒋介石而希望和平解决这次事变的态度后，于22日派宋子文、宋美龄到西安谈判。周恩来和张、杨一起参加谈判。经过两天商谈，宋美龄等作出“停止剿共”、“三个月后抗战发动”等项承诺。24日晚，周恩来在宋氏兄妹陪同下去见蒋介石。蒋介石又当面向周恩来表示：“停止‘剿共’，联红抗日。”

12月25日，张学良没有征得周恩来的同意，就亲自陪蒋介石乘飞机离开西安回南京。一到南京，张学良就失去了自由。消息传出后，西安出现了动荡不安的局势，少数极端分子制造了“二·二”事件，内战危险重新出现。周恩来在最困难的情况下，

坚定而细致地进行工作，终于基本保持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成果。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内战在事实上大体停止下来，国共关系取得迅速发展。西安事变显示在全国范围内，包括国民党营垒内部，实现团结抗日的要求非常强烈。中国共产党在事变中不是乘蒋之危，置蒋于死地，而是力主和平解决，充分表明了对团结抗日的诚意。西安事变，正是在国共两党重新合作的客观形势渐次成熟的时候，起了促成这个合作的作用。毛泽东在当时就说：“西安事变成为国民党转变的关键。没有西安事变，转变时期也许会延长，因为一定要有一种力量来逼着他来转变”。“十年的内战，什么时候结束内战？就是西安事变。”所以毛泽东称西安事变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张学良称之为“影响中国近代历史进程的大事件”。西安事变推动了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奠定了抗战胜利的基础。

本辑作者中共沈阳市委党校陈志新教授经过近十年的努力，跑了全国许多地方，走访调查，收集到大量宝贵的三亲资料，并同档案文献资料核实印证，积累了翔实可靠的材料。同时博采众家之长有较新的观点，在此基础上，作者完成了这部力著。它既是人物小传专著又不失文史资料的特点；本辑选题是西安事变，但角度新，把视觉缩到积极参与或积极支持西安事变的东北军将领这一侧面来展现西安事变的全貌。作者并没有拘泥于西安事变这一段历史，而是突出重点、兼顾全面，对参与或支持事变的每位将领都作了全面的、公正的、客观的评述。读起来使人感到这些将领都是爱国、爱民、不断追求真理的人。因此，才有西安事变时的表现，才能在抗日战争中，本着张学良将军发动西安事变时的初衷，坚持团结抗战，奋勇杀敌，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做出了贡献与牺牲。

作者通过收到书中的 26 位将士的言行，以人系事，以史代论，来展现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出于爱国热忱以惊险的手段，

自我牺牲的精神，捉蒋放蒋，终于实现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宏愿。这一宏愿充分反映了全国人民特别是东北民众以及东北军广大官兵的心声，这从事变时东北军将士的言行可以得到佐证。东北军中无论是手握兵权的高级将领或是任职南京政府的官员，还是在野赋闲的军政人员，他们在不同的岗位上，发挥着不同的作用。这些力量的总合是推动张学良发动事变的基础。

东北军在西北“剿共”战场上，首先沟通红军和张学良联系的是 619 团团长高福源。这件事似乎不大，但其意义却十分深远，是后来一切事情的发端。67 军军长王以哲则是在陕北前线第一个和红军代表谈判并达成停战协议的人。后来张学良援助抗日红军的一切任务又大部分是通过王以哲来实现的。因此，毛泽东称王以哲和张学良一样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首先提倡与首先实行者”。1936 年 4 月 9 日，张学良和周恩来在延安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谈，是王以哲安排的，在他 67 军 129 师师长周福成的防地内进行的。周福成负责张、周会谈的警卫工作。于学忠则是占领兰州军事重地，负责打通国际交通线的。刘多荃是临潼华清池扣蒋战场的指挥官。唐君尧、周福成是临潼兵谏扣蒋的内外线指挥者，以及内线攻击华清池的将士白凤翔、刘桂五、王玉璠，他们是扣蒋的执行人，当他们接到张学良的命令后，无一不衔命而行奋勇当先，出色地完成了张学良交给的任务。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是张学良的既定方针，也是中国共产党力主的方针。西安事变的宏旨是逼蒋停止内战，团结全国一切力量进行抗战。所以张学良将军对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主张，也得到绝大多数将士的理解与支持。如于学忠、王以哲、何柱国、董英斌、高福源、米春霖、谢珂、刘伟等人，坚决支持、贯彻张学良和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为此，王以哲被少数极端分子杀害了，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于学忠、何柱国等高级将领未被暗杀行动所吓倒，仍是坚持和平方针，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作出了不同贡献。就连任职南京国民

政府的东北籍官员，也在困境中苦苦周旋。甚至那些在野赋闲的东北军将领，也时刻关注西安事变的事态发展以及张学良将军的安危。张学良将军送蒋回宁被扣后，旅居平津的东北名流30人，他们甘冒蒋介石报复的危险，以刘翼飞领衔联名通电，痛斥蒋介石背信弃义的卑劣行径，强烈要求宋氏兄妹实现保证张学良将军安全返回西安的诺言。

由于蒋介石背信弃义，张学良将军长期遭到囚禁，杨虎城将军被囚12年后，竟于1949年9月惨遭杀害。周恩来高度评价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的历史功绩，赞扬他们的爱国主义思想和自我牺牲的精神。周恩来指出“历史应该公断，西安事变是蒋介石自己逼成的；蒋介石抗战是张、杨两将军顺从人民公意逼成的”，张、杨两将军“是千古功臣”，“是千古不朽的人物”。这已是历史的定评。

政协沈阳市文史资料委员会及作者怀着无限崇敬的心情，征编出版《西安事变与东北军将领》专辑来纪念西安事变六十周年，也是对张、杨两将军的英名及他们爱国主义思想和自我牺牲精神，表示无限景仰与怀念。同时对散居在海内外的传主后裔、亲属也是一个慰藉。他们都关心祖国、桑梓家乡的建设，更关心家乡人民对其先辈作出公正的评价。对海峡两岸民众史学工作者的思想交流，也会起到传媒作用。这本专辑的出版也一定能为沈阳地区的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开拓前进是有益处的

任 殿 喜

1996年10月18日

# 《西安事变与东北军将领》

## 目 录

|           |       |
|-----------|-------|
| 序.....    | (1)   |
| 于学忠.....  | (1)   |
| 王以哲 ..... | (28)  |
| 董英斌 ..... | (59)  |
| 何柱国 ..... | (76)  |
| 刘多荃 ..... | (98)  |
| 唐君尧.....  | (113) |
| 白凤翔.....  | (128) |
| 刘桂五.....  | (141) |
| 周福成.....  | (155) |
| 高福源.....  | (176) |
| 张政枋.....  | (191) |
| 黄显声.....  | (206) |
| 米春霖.....  | (226) |
| 谢 珂.....  | (234) |
| 刘 伟.....  | (247) |
| 刘震东.....  | (254) |
| 王树常.....  | (261) |
| 李振唐.....  | (278) |
| 鲁穆庭.....  | (284) |
| 张振鹭.....  | (296) |

|                |       |
|----------------|-------|
| 刘翼飞.....       | (305) |
| 高纪毅.....       | (315) |
| 鲍毓麟.....       | (329) |
| 栾贵田.....       | (337) |
| 应德田.....       | (342) |
| 王玉璠.....       | (371) |
| 西安事变前后大事记..... | (383) |
| 后 记.....       | (400) |

## 于学忠

于学忠，字孝侯，1890年11月19日（清光绪十六年十月八日）出生于毅军驻旅顺口军营中。祖籍山东蓬莱。其父于文孚久隶宋庆毅军，当过旗牌官，后任帮统，清光绪年间随宋庆驻守旅顺口。于文孚、米振标、张作霖同为宋庆老部下。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日寇挑起甲午中日战争，年仅5岁的于学忠随母漂海回籍于家庄村躲避战乱。

于学忠幼年在籍入村塾启蒙，开蒙老师，尊于母意为于取名学忠字孝侯，意为忠孝两全之意。

于学忠年13岁时辍学，后在毅军中补兵额领饷。1904年（清光绪三十年）于在毅军所办随营学堂肄业。毅军移防通州，设武卫左军随营学堂培养将弁。于学忠于1908年（清光绪三十四年）入堂步科习炮兵。1912年夏以第一名毕业。在毅军中任哨长、哨官。同年于随毅军驻防热河。1914年，被林西镇守使米振标拔充为镇守使署副官长，5月于任陆军步兵少校，6月升陆军步兵中校。

1917年北洋陆军第18混成旅建立于湖北，于学忠任该旅炮兵营长，1922年1月升任第2团团长的。1923年9月，于晋升陆军少将。同年12月，升任第18混成旅长。

1924年6月，于学忠授将军府将军。

1925年10月，吴佩孚复到汉口，被孙传芳、萧耀南等拥戴为14省“讨贼”联军总司令，遂将于学忠第18混成旅扩编为26师，于升为师长。师部驻施南。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从广东出师北伐，长驱入湘，占长沙，下岳州，直指武汉，湖北震动。

于学忠因鄂局势紧张，赴宜昌商洽军事，吴佩孚即委任他为长江上游副司令，将师部移驻宜昌。同年10月10日，吴佩孚狼

狈逃往河南，其部下大部溃散或投靠他人。于学忠因不愿背叛吴，遂留吴在军中暂住。

吴佩孚困居邓县，自知大势已去，遂就商于于，决定入川依附杨森与刘湘，于则表示，愿解甲归田“与我帅同进退”，因此，于学忠对蒋介石、阎锡山、张作霖三方面代表的拉拢，均无动于衷。在吴佩孚去后，于学忠安置好所部，也偕第二夫人离军取道汉口转赴上海，返回山东蓬莱故里。奉方代表亦同道转返北京。

于学忠下野后，所部归附冯玉祥麾下。不久，于部师、旅长因不满冯玉祥又将部队拉出去，带到安徽蒙城，公推代表到蓬莱找于学忠谋出路。事为张作霖父子所闻，张学良遂派代表持亲笔信邀于到北京晤谈。于学忠感到时机成熟，义不容辞，遂筹足路费，去北京与张氏谋面。

张作霖在中南海怀仁堂延见于学忠，态度热诚，语言爽直。张说：“我与令尊系少年朋友，旧在宋老帅（指毅统帅宋庆）部下共事5年，此是事实，并非我自居尊长。我们不是外人。”于学忠说，但求部队得以安置，去军之将，无劳垂念。张作霖说：“不然，今日奉军并不需要此三两师人，只是相信你，要你合作。此军仍须你统带。你对吴子玉情形我们都已知道，但能以对吴者对我就够了。此后服装、粮饷、给养、军械均照奉军发给，你可即去将军队整理带到北方，其他事情可与学良接洽。”当即留于学忠共进餐。于学忠在北京与张作霖只见此一面。当为和奉系发生关系之始。

于学忠后又拜见张学良，两人一见如故，信而不疑，极为相投。旋即发表于学忠为安国军20军军长，归三、四方面军团指挥。1927年9月，于学忠晋升陆军中将，获二等文虎章。12月，授捷威将军名号。

1928年7月张学良命于学忠所部奉军继续东撤。于部移防乐亭，后又退驻山海关。后参加对张宗昌、褚玉璞各部缴械收编之战，东北军撤退即告完成。

7月4日,张学良就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子继父业,执掌东北大权。励精图治,锐意进取,采取一些利国福民的措施,诸如首先整编军队、取消军师番号,一律以旅为单位,编为国防军和省防军。于学忠任军事参议官。同年11月21日,张学良委任于学忠为临绥驻军司令,驻节山海关。

1930年1月,于学忠获青天白日章和二等宝鼎章。3月,冯玉祥、阎锡山与桂系(李宗仁、白崇禧)三派结成反蒋联盟,与蒋介石在中原混战(史称中原大战)。当时张学良拥重兵于关外,有举足轻重之势。各派代表云集沈阳,对张进行拉拢。张学良尚举旗不定,为此,在沈阳举行一次有张作相、于学忠、王树常等参加的高级会议,专门商讨应付时局办法。于学忠、王树常表示静听张学良决定。

蒋介石因派代表拉拢张学良无结果,遂采取阴谋分化东北军的手段,利用临绥驻军参谋长陈贯群(系蒋介石留学日本的士官同学)两次写信给于学忠,进行拉拢;继之又派参议石某带亲笔信给于学忠,劝于举兵向西,愿以华北地盘为交换条件。于把信交给张学良,并复函与蒋说唯张学良之命是从。蒋介石仍不死心,又遣何成浚用重金收买于部23旅旅长马廷福叛张投蒋。于闻讯后,一方面劝马以忠义为重,一面告急张学良采取应急措施,制止了这一阴谋。是年8月中旬,蒋介石攻下济南,张学良实践出兵关内的诺言,于9月率东北军入关。于学忠受命为第1军军长;王树常为第2军军长,9月26日进驻平津地区。

经张学良保荐,南京国民政府任命于学忠为平津卫戍司令。于学忠成为东北军重要将领之一。

1931年7月,盘据在河北邢台地区的小军阀石友三,趁张学良患伤寒病入院之机,在天津日本驻军的唆使下,兴兵作乱,叛张反蒋。东北军诸高级将领中,于学忠力主用武力讨伐之。

石友三叛乱平息后,于学忠、王树常从前线凯旋而归,张学良大病方愈,亲到车站迎接。欢迎之隆重可想而知。之后,于学

忠、王树常去南京谒见蒋介石。蒋介石对于、王分别赠 10 万元进行拉拢。于、王回到北平后，将此事如实告诉张学良，于更得张学良器重。此间，张学良在北平添购一批新汽车，特别关照加购一部最新式的 7 座别克牌黑色轿车赠于学忠。价值一万数千元。东北军高级将领中能享此殊荣者，于是第一人。

1931 年 9 月 18 日夜，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时张学良正在北平大病方愈。接到沈阳告急电后，于 19 日凌晨 1 时许，在协和医院召集戴翼翹、于学忠、万福麟、鲍文樾等重要将领开会。张学良首先说明，“日人图谋东北，由来已久，这次挑衅的举动，来势很大，可能要兴起大的战争。我们军人的天职，守土有责，本应和他们一拼”，奈日本倾全国之兵，“绝非我一人及我东北一隅之力所能应付。现在我们既已听命于中央，所有军事，外交均系全国整个的问题。我们只有速报中央，听候指示。”于学忠等诸将领均以张学良的主张为然。

此后，张学良又先后召集东北外交委员会委员和平津名流会议，咨询对东北问题的意见，于学忠建议张学良说：“日本人现仍继续侵占东北各地，横行不已，我们虽避免全面的冲突，但也应集中几个旅的兵力，牺牲他 3 个团，给敌人以打击，以挫其侵略气焰，并取谅于国人。”于学忠还建议，黑、吉两省的军事负责长官，都应各返防地掌握部队。张当即说：“这些主张都甚好，我现正命荣翕生（荣臻的字）新编一军，可即令他担任这项任务。”但事隔一天，张学良单独邀于学忠谈话，推托说，“因为荣翕生已率领部队撤下，你的意见已赶不及照办。我已数次劝告吉、黑两省的军事负责长官返回原防，看他们的举动，均有不愿即行回去的意思，只好候候再说。”于快快而归。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得寸进尺，在天津制造暴乱，当时河北省政府主席王树常对“便衣队”的暴乱进行过坚决的镇压，但在国民党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的约束下，恐与日寇惹起更大冲突，有时镇压暴乱显得无力。同时，中国军警不能进入

日租界捕人。王只能采用每日戒严的消极防御办法。致使市内小商小贩及三轮车夫约3万人生活受到影响，津市地方人士对王树常颇多指责。王苦于应付，急于求去，张学良为此约于学忠说：“河北问题，庭五（王树常的字）很难应付，你作事果决，意志坚强，我想让你二人的职务对调一下。”1932年8月17日南京国民政府明令王树常的河北省主席与于学忠的平津卫戍司令对调。同月，于兼任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于学忠就任河北省政府主席后，大刀阔斧进行镇压“便衣队”，并立即宣布撤销戒严令，恢复正常秩序。于一面调两团正规军改穿保安队服装，轮流进入市内，加强警戒。一面指示驻北平南苑的东北军炮兵第7旅旅长乔方“作好临战准备，一接命令，立即派出一团炮兵，驰往天津。如果日军公然发动战争，就将所有炮弹倾注到海光寺日本兵营里。”决不允许日寇利用“便衣队”乌合之众，兵不血刃像拿沈阳那样，白拣天津。“便衣队”遂即销声匿迹。不敢再有滋扰。于学忠并未以此为满足。“便衣队”的头子郝鹏仍藏匿在日租界，必须将郝处决，才能根除“便衣队”的隐患。遂密令天津市公安局长派特务队乔装潜入日租界，将其捉拿处死。岂料亲日分子黄郛，从北平连续打来电话，并派专人到津，敦促于学忠要顾全大局，把郝鹏放走，免于给日方造成借口，指示今后不可再去日租界绑人。黄郛是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是于的顶头上司，于学忠受其制约不得已乃将郝鹏从公安局解押到51军军部，经军法处审讯，取得亲笔悔过书，保证今后不再于河北省境内闹事，始将其释放。

1933年初，长城抗战时，于学忠任华北第一军团总指挥兼陆军第51军军长。3月，热河失陷。4月，张学良为蒋介石所逼，下野出国“考察”。临行前将东北军编为4个军，其中53、57、67军计约9万人交由万福麟、何柱国、王以哲统帅外，其余17万人交由于学忠指挥。张学良原参议杨毓珣不解地问张学良：“于学忠非东北人，兵权太大，你出国了怕要靠不住吧？”张回

答说：“东北军最靠得住的就是他，将来收拾东北军残局，非他莫属。”

同年5月，于学忠兼任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6月，兼任天津市市长。日本人为于的实力不断扩大所忌惮，曾用种种卑鄙手段通过在天津的亲日分子，对于学忠极力拉拢，若于肯于附逆，不但华北地位可保，还可扩大势力取代张学良，用日寇侵占东北时掠夺的一切装备武装于的部队。于不为所动，反而警告汉奸亲日派说：“我是地方官吏，个人守土有责，用不着听谁的。”日寇见此计不成，随即变换手法，利用孙传芳去分化于的部下。于学忠投奉前，曾是孙的部属，孙在东北讲武堂毕业的旧属多在于学忠军内。孙传芳同51军已被免职的旅长马廷福和驻葛沽的114团团团长张冠英勾结起来。于学忠得到情报后，即派部往捕，马、张二人闻讯潜逃，日人瓦解于军的阴谋未能得逞。日本侵略者恼羞成怒，遂采取了更加卑劣的手段，妄图置于学忠于死地。于是干出如下勾当：

①收买大流氓王玉珍为行刺首领，网罗暴徒10多人，携带日寇发的手枪和手榴弹，潜伏在马路旁，待于学忠赴省府上班时暗杀之。后被保安队拿获，据交待系受白坚武（原系吴佩孚政务厅厅长）等指使。②买通于的随从副官巫献廷和第51军司号官傅鉴堂，俟于更衣沐浴时动手行刺，被于发觉擒之，讯供称，也是受白坚武所唆使。③收买于的旧部曲子材勾结厨师袁某，在食物中投毒，后袁自首，使于化险为夷。④利用石友三、刘桂棠等收编的匪军进行骚扰，酝酿建立“华北国”，到处造谣惑众，干扰于政权，然而日本人凡此种卑鄙伎俩均未得以实现。

1933年5月，蒋介石与日本签订了卖国的《塘沽协定》后，日寇得过进尺，无理要求冀东特殊化，不准中国军队驻扎冀东，只能由保安队维持地方社会治安。相反，日本军队可以在冀东自由行动。身为地方军政长官的于学忠感到莫大耻辱。然而在日、蒋双重压力之下，于学忠不敢公开对抗日寇而违抗蒋的命

令,只能暗地里千方百计不失时机地与敌人展开斗争。当时国民党冀东专员殷汝耕要组织保安队维持地方治安,于学忠乘势拨两个团给殷汝耕,于从113师、114师中,各选一个富有爱国思想的现职团长,负责组织冀东第1、2保安总队。每总队4个大队,相当一个加强团,班长以上人员也从两师挑选,武器装备按正规军标准。51军撤离华北时,这两个保安总队仍留在冀东。至1938年6月归队。

由于于学忠在河北对日本态度强硬,1934年,日寇迭次造谣,诬称大沽口沿岸仍有驻军及军事设施,对日不利,并以此为借口,在天津海光寺日军司令部周围桥梁下,设置地雷、铁丝网,并挖有掩体等,俨若战事状态。与此同时,以换防为名在铁路沿线增兵。一次,日军竟在省政府附近举行军事演习,意在示威。日军还在天津中原公司楼上安装一门小炮,对准省政府,等等,不一而足。于学忠并不示弱,遂在天津附近集结了3个师,致使日寇不敢轻举妄动。

1934年5月,日侨民小岛助一往河北丰润县第2区韩家寺访友,为冀东土匪所杀,暴尸郊外。日方以此借题发挥,有意扩大事态。日酋驻天津司令梅津美治郎派武官紫山向于学忠提出五项无理要求:①由河北省主席向日本驻屯军司令正式道歉;②惩办唐山公安局长及县长;③赔偿1万元;④缉凶;⑤保证以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当即遭于学忠的严正拒绝。他说小岛助一到我地方访友,事先并未通知我方,我方无责任,故不能正式道歉。日方见同于学忠交涉无效,乃向南京政府及黄郛提出抗议,黄郛、何应钦召于学忠赴北平研究此事,希望仍由于出面处理。于学忠表示决不做丧权辱国之事。

1935年4月,国民政府任于学忠为陆军2级上将。

面对日本一连串的侵略事件,南京政府一再退让,日本侵略者更加有恃无恐,唯对于学忠有所顾虑。日本驻北平大使馆武官高桥说过,于学忠“与日军势不两立”,不除掉于,无法实现其

侵占华北的野心。1935年5月2、3日两天，日寇在天津日租界连续暗杀了《国权报》社社长胡恩傅，《振报》社长、“伪满洲国中央通讯社”记者白逾桓两个汉奸，却栽脏陷害，诬中方所为。日方以此为口实，于5月29日向何应钦提出苛刻条件，要求罢免于学忠河北省主席职，调51军出河北省等。同年6月，国民党北平军分会委员长何应钦屈从压力与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签订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日本所提出的觉书中的第一条即为罢免于学忠。要求将于部51军撤出河北，何为了讨好日寇，三番五次亲自打电话逼于学忠辞职，并叫于的办公厅主任鲍文樾与于学忠通话，要于立即辞去河北省主席职。于学忠认为何应钦是讨好日寇，丧权辱国！张学良下野出国前，嘱托他代为照管好流亡在关内的东北军民，于深感有负张的重托。于学忠在电话里同鲍对话时非常激愤，请鲍文樾转达何应钦：“除非于某死啦，不死，有我这口气在，就绝不辞职。”后来何应钦邀请于去北平开会，并告诉于；现在中央决定将河北省政府迁到保定，天津是沿海大商埠，保定则位于全省之中。未几，南京明令河北省政府移师保定。于学忠到保定后，国民政府又命于学忠率部开赴陕西、西安，出任川陕甘边区剿共总司令，时在1935年6月11日。同年冬，于任西北剿共第2路军总司令，辖第6纵队（司令官王以哲）、第7纵队（司令官董英斌）、第8纵队（司令官自兼）。11月，南京国民政府发表于学忠为甘肃省主席。同月，国民党召开五大，于学忠当选中央执行委员。1936年7月，获国民革命军誓师十周年纪念勋章。

1936年9月中旬，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部队在甘肃会宁地区会师，蒋介石下令堵截。51军派出114师、118师渡过黄河北进，在永登一带布防。为争取于学忠，9月22日，毛泽东派彭雪枫持亲笔信往见于学忠。毛泽东在信中说：“两军相处密迩，未能通候，甚以为歉。夙稔先生热诚爱国，对日抗战早具同心。”并说明派彭雪枫前去商谈联合救国的事宜。